



汉语基督教经学丛书
Sino-Christian Scriptural Studies

游斌 主编

圣书与圣民

Holy Book and Holy People

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Israel

游斌 著





汉语基督教经学丛书

Sino-Christian Scriptural Studies

游斌 主编

圣书与圣民

Holy Book and Holy People

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

Historical Memory and Ethnic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Israel

游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书与圣民: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游斌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5

ISBN 978-7-80254-377-5

I. ①圣… II. ①游… III. ①基督教-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6890 号

圣书与圣民

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

游 斌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95215(发行部) 010-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1 印张 400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377-5

定 价: 58.00 元

“汉语基督教经学”编委会

主 编 游斌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编委会学术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田海华	四川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孙尚扬	北京大学哲学系
陈贻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周伟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孟振华	南京大学哲学系
林子淳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姜宗强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系
梁 慧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章雪富	浙江大学哲学系
赖品超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

总 序

在中国用汉语研究圣经。是何？为何？如何？

作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神圣经典，圣经的当然之义是一部信仰之书，但它更深的含义应该是跨越了漫长时代、沉淀着一代代信仰群体之信仰—文化经验之书。

对中国读者来说，圣经是在新教来华后才翻译出来的，其语言及文化风格带有近代之特征，圣经阅读的经验与近代文学相仿。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圣经之历史与文化源起，就可发现它其实与中国文化之经典，如《易经》、《诗经》，同样古老。圣经的文化时空主要在被称为“圣地”的巴勒斯坦地区，它正处于世界三大古代文明即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交汇地带。在旧约时代，古代以色列正处于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的中枢地带，甚至可以说：“古代以色列文明乃以两河为父，埃及为母”，旧约文本同时蕴含着两个最古老文明的基本要素。在新约时代，希腊文明又强势地进入巴勒斯坦地区，成为圣经的又一主流，基督教是希腊与希伯来文明之“文化混血儿”。就此而言，圣经正是由以西亚为中心的近东诸文明凝结而成的精华。

以此观之，在中国用汉语研究圣经，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文明史意义。因为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看来，最主要的两极就是：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以东亚大两河流域（即黄河和长江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①虽然早在西汉和罗马帝国时期，它们之间就发生了一定的接触和交往，但其深层对话却总被各种历史因素所打断，始终是断断续续的。

^① 许宏著，《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20-29页。

圣书与圣民
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

即使到了近代中国，它们之间的对话也因为西方的强势而呈现一方突入而另一方被动接受的状态，未能进入最核心的经典对话层面。因此，今天在中国用汉语研究圣经，就是要尝试在两个最古老的、彼此独立的文明体系之间建立深层文化互动。在此意义上，在中国用汉语研究圣经，不仅将一个当今的基督教文明引入中国，而且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最有活力的一大源头即以两河流域为根基的两希文明，引入到今天仍然活生生的东亚大两河流域。

当我们指出这就是汉语基督教经学深远意义之所在时，似乎马上就掉入一个陷阱之中，即：一方面，圣经研究是基督教的，圣经文本是通过基督教才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以西亚为中心的近东古文化才成为活的文明；另一方面，圣经研究又是非基督教的，因为圣经文本，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产生于基督教发展为成熟宗教之前的时期。因此，圣经与基督教的关系，正如文化研究之“渊源”与“传统”之关系。如海德格尔所说：“传统把承袭下来的东西当作是不言自明的，并堵塞了通达源始‘源头’的道路，而流传下来的许多范畴和概念一部分本来曾是以真切的方式从这些源头汲取出来的。传统甚至根本使这样的渊源被遗忘了。传统使人们以为甚至无须去了解一下是否有必要回溯到渊源处去。”^①将这一洞察运用于圣经渊源与基督教传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基督教传统本来是以真切的方式从圣经源头中汲取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它又遮蔽着圣经渊源，甚至使人失去要去追溯渊源的意识。

就此而言，汉语基督教经学的本质是充满张力的。它的意旨是“面向渊源”，通过对基督教的原初文本的研究，来解除后世各种传统对渊源的遮蔽，是一个“去蔽”的工作。虽然圣经文本本身并非就是渊源，但可能正是在智慧的源头处，才是真正智慧的藏身之处。然而，去除基督教传统对圣经渊源的遮蔽，并非就是对基督教传统本身的简单抛弃。毋宁说，它是将传统的积极意义揭示出来，即一定的传统都是渊源的逻辑结果和历史呈现，是渊源的实体化、现实化。“去蔽”的结果，亦不过是找到呈现在传统中的渊源。它对传统的批判、消极意义始终是隐而不露的、间接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

^① 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27页。

渊源正是在后世传统的更叠之中才以真切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圣经文本和后世基督教传统之间的互动对话，是我们寻求圣经渊源的一个必由之路。

因此，汉语基督教经学可谓圣经研究（Biblical Studies）这一学科在汉语语境中的一个特定样态。它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释义的圣经研究。它相当于英文之所谓“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的内容。它既包括对圣经文本进行细致的语文学、历史学分析，也包括将圣经文本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处境之下的社会科学探究。其目的是形成对经文进行“细解深读”的能力。二、与神学对话的圣经研究。圣经作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源头，其生成时间乃早于后世各种具体的神学传统，因此，圣经研究学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去神学”的倾向。但如前所述，后世神学传统既是对圣经渊源的遮蔽，也是对圣经渊源的显现，因此，放弃与神学对话的圣经研究，将使圣经蜕化为光秃秃的文本，失去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也将使其丧失与汉语语境中的其他经典传统对话的能力。只有保持与历史和当代诸多神学传统进行对话的意识，才能使汉语语境的圣经研究发展出与人文学术、本土宗教传统进行全方面对话的思想能力。三、创生的圣经研究。汉语基督教经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圣经承载的人类文明史上的另一个主要源头，即以两河流域为根基的两希文明，引入到以汉语为载体的东亚大两河流域。在与汉语既有的经典传统的比较研究中，在与文化社会处境的深度对话中，圣经渊源将展现出它的不断更新、演化的创生力，化身于对之而言曾经陌生的中国思想语感之中，形成创造性的中国化的基督教思想传统，并推动当代中国多元思想文化格局的形成。在最后这一层意义上，汉语基督教经学就是汉语神学。

汉语基督教经学充满张力的内在本质，决定了它居于人文学与神学之间的学科属性，是一个尝试在比较和对话中“接着说”的思想实验。它应当具有以下基本特性：一、开放性；它不划定任何固定的边界，以汉语从事的圣经研究工作，都可称为汉语基督教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二、实验性；它没有任何既定的议程，将按照具体的研究进程决定未来的道路。三、反思性；它将努力站在其他研究角度反思自身，并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理论假设。

与国际圣经学术界相比，汉语学界的圣经研究可谓刚刚起步。但中国文

化与西方相比的异质性、汉语圣经学界所处的人文社科语境，却要求汉语的圣经研究必须在某些前沿性的领域开展工作。在此我们期待各路友人的参与和帮助。如果我们能在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在目前还尚未发展成熟、但居于前沿的领域内，做出开拓性的工作，也许还能立于世界学术的潮头。

是为简序。

游 斌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2011年4月

绪 论

一、本书主要议题及意义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处身于大大小小的各样群体之中，人们总是问道：“我们是谁？”但人类学家提醒道：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是谁”，而是“我们如何宣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何宣称我们是谁”。

对于人类的分群冲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要画一个圆，其实只需在白纸上画一条边线，也就是说，族群身份的建立乃取决于人们所划分的“我群”与“他群”之边界。但这样的比喻，显然是将人们的族群身份仅仅视为一种区别人我的外在标志。然而，人们认同某一种族群，不仅是要建立一个外在身份，更是要培养一种内在意识，是对某种精神理念、生活方式的体认和追求，最后表现为对一个伦理共同体的归属感。就此而言，更恰当的比喻是：要画一个圆，不仅要画一条边界，更需要在界线内涂上绚丽的色彩。

无论是为了建立我群与他群之间的边界，还是要赋予族群身份以某种精神内涵，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族群历史的叙述或书写。人们叙述或书写历史，并非是要记住过去，而是要面对现在和未来。历史写作是一个不断还原和重新理解过去的过程，但人们既不可能回到历史之中，又不可能记住在时空中发生的一切。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进行历史写作时要面对的困惑，不是事实太少了，而是事实太多了。因此，历史书写总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和解释性重现，总是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被赋予客观时空意义的历史书写，从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一种社会记忆。

正如奥古斯丁对于人类记忆的研究所揭示的，我们以一个单数的方式称

圣书与圣民
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

呼记忆，但它实质上是包含三个名词的复数，即记忆、理解和意志总是在一起出现的。他说：“我记得我有记忆、理解和意愿；我理解我在理解、意愿和记忆；我意愿我所意愿、记忆和理解。”作为社会记忆的历史书写，也同时地包含着社会理解和社会意志。所谓社会理解，就是指被记忆的历史事件总是被解释之后的，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而言有意义的。从表面看来，历史是记载事件，但其实质却是解释事件，每个群体都按自己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对过去进行重构。所谓社会意志，是指社会群体在对历史的书写中，还将其它的情感、忧惧与期盼等投射到对过去事件的记忆之中。它的形式是讲述过去，但其实质却是表达这一群体对于未来的态度和信念。因此，对历史的记忆需要人们意志的投入（commitment），是人们在面对不确定的、或然性的过去时的一种“相信”。说人们记住了一段历史，毋宁说是人们相信或接受了一个故事。但因着这种“相信”，无数的个体可以通过意志的选择，成为一个在面对不确知的未来时做出相同选择和决定的人群。

在一定意义上，被记忆的历史如同艺术中的“错觉”，真正要做的工作不是丢弃或鄙视错觉，而是珍视并尊重错觉，因为只有富于理解力、敏感而有激情的人们才能产生错觉，同时，也只有身处宏大而活生生的历史场景之中，才能产生千变万化的错觉。而从社会意义来看，正是由于有“错觉”的历史记忆，才在不同时空之下，构建出各种不同身份取向的特定族群。

本书将对圣经的文本层累进行分析，将之视为古代以色列历史记忆的不断堆聚、再现或重编，由此通过考古研究与文本分析之间的参照互动，来讨论以色列族群的建构过程，并进而探讨圣经文本、历史记忆、族群构建之间的一般关系。我希望，这样的研究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通过“层累形成的以色列古史”之假说，为人们理解圣经文本史之特点提供帮助。圣经作为“以色列人”（既指族群意义上的以色列民族，亦指宗教意义上的犹太—基督教信仰群体）的古史叙事，自身呈现出一个时间顺序的历史框架。但通过文学和历史的批评方法，可知古代以色列史与圣经文本史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圣经文本是在漫长时空中错落地层累形成的。说它是以色列古史，还不如说是以色列人关于古代的记忆史。如同人们

站在隧道口外看里面的灯光，感觉它们嵌于一个平面之上；惟当深入隧道，方知灯光之错落疏离。层累着的圣经文本单元，就如同这隧道中的灯光。要将它们之间的层累关系拆解开来，只有深入历史时空，借助经外文献、考古研究、文学批评以及人类学理论才有可能。而且，对于圣经这样一个充满信仰内涵之文本，探讨文本单元之间的关系及流变，比确定某一文本单元的形成时间要更有意义。

其次，本书将提出圣经叙事的“社会记忆”诠释理论，以期超越圣经以色列史和文本史研究中的极小主义和极大主义之争。在圣经研究学界，极小主义认为圣经文本形成于相当晚的时期，圣经以色列史是虚构的历史；极大主义认为圣经以色列史是真实的历史，圣经文本具有早期历史写作的特点。两者虽然属于对立的阵营，实际上秉持的却都是实证主义的史学观，将圣经的历史叙事理解为一个或真或伪的史料库。本书将把圣经叙事理解为社会记忆，不同时代的“以色列人”带着忧惧或盼望，去记录、解释、重述、重组甚至想象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制度与人物，以诠释或塑造他们对于族群本质的理解。甚至可以说，它们都是积极意义上的“历史错觉”。这种充满解释和想象的历史叙事追求的不是事实性（factuality），而是现实性（actuality）。它们不只是被动地反映或记载历史事件，而是通过故事性讲述，使讲者和听者分享同样的社会记忆，共同沉浸于历史叙事的意义世界之中，并最终被型塑为一个有着共同心理意识的伦理共同体。

再次，本书将对以色列人的起源提出一个解释，并进而探讨社会记忆与族群建构的一般关系。人们沉醉于讨论以色列人的起源，因为在这一问题之上，正纠结了圣经文本史、以色列史乃至犹太—基督教信仰的关键问题。考古学和古语言学无疑是解答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但对于以色列人（文明）这一凝结古代近东文明成果的体系来说，要探知它的起源，考古学并不能提供最终的答案。借用一个地理学比方来说：江源如帚，大河本无源。对于如何确定江河之源头，本来就存在着多样的标准，更何况要寻找不断变易的、模糊的、或逝或存的文明之源。因此，本书在综合圣经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参照人类学的族群主观认同理论，将探寻以色列人起源的重点放在对

圣书与圣民
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

圣经以色列历史记忆的分析上。圣经文本之层累叠加，正如江河之多源汇聚，反映了以色列人的多元起源和不断聚散。恰恰要等到圣经中这些文本单元被汇编为一个整体，即多元的社会记忆被整合起来之后，一个作为整体的“犹太—以色列人”才可能最终成型。

最后，我希望藉着对“以色列人”概念的探讨，能够一窥犹太—基督教传统对于信仰的理解。在圣经传统中，以色列人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更是一个宗教概念，是与耶和华立约的“真人”。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既表示古代近东的一个民族，也表示宗教上的“上帝子民”或“真教会”。通过对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和族群建构之分析，我们可知，以色列族群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生成的（be born），而是因选择而成为的（become by choice）。以色列族群的边界是模糊的，是可以因心灵的转向即信仰而被跨越的。那么，选择什么，相信什么，可以使人成为“以色列人”呢？答案就是：圣经的历史叙事。这也是为什么犹太—基督教被称为“历史信仰”（historical faith）的原因所在。从整体而言，圣经就是一个历史命题。通过在心灵层面对这个历史命题的接受或采纳，人们成为“以色列人”。但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历史命题，并不在于它可以被历史地证明为客观或真实。一个外在的客观事件无须人们信心的投入。信仰者与圣经历史叙事的联系，不是与所谓历史真实的联系。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圣经的历史叙事只是或然为真，有可能被证明是虚假。圣经历史叙事的精髓所在，恰是一个故事，一个用历史讲述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意义系统。它需要读者在它面前进行抉择，是否愿意通过信心将自己交托给这个故事，是否愿意委身于这个故事，是否愿意在生活中为它留出一个异乎寻常的位置。在这个故事的面前，不是人们去审判它是否真实，而是在聆听、接受中等待被改变。

总而言之，本书希望通过对圣经历史记忆与以色列族群构建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探讨民族—宗教身份之内涵及其意义。我将试图说明，人们的族群身份乃处于变迁和流动之中，人们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述、重整或重释，来塑造、跨越或改变自己的身份。我无意于解构“身份”对人们的意义，也不希望人们随意地、盲目地改变身份。我只是希望身份是人们进行反思性的抉

择之后的结果，是人们对于某种精神理念的内在信服，而不仅仅成为一种区分你我的标志。将这种反思性的身份意识运用于人际关系之中，就是希望人们能够尊重彼此的身份抉择，以此促进人群之间的平等、和谐与共荣，最终迈入“美美与共”的因异而和的社会。

二、本书结构与内容

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在于分析犹太—以色列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活处境中如何形成他们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又如何沉淀在不同层累的圣经文本之中；另一方面在于讨论这些历史记忆或圣经叙事形成之后，对于犹太—以色列族群的形成以及本质界定产生的影响。其关键就在于“叙事”与“族群”即所谓“圣书”与“圣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方便读者阅读，我先将本书的一些用语及全书结构做一简要交代。

首先是对两个关键词“叙事”和“族群”做一解释。叙事（*narrative*）与解释（*exposition*）、论证（*argumentation*）和描述（*description*）一起，被称为人类言说的四种基本修辞。它包含几个基本要素：有一个时间顺序的框架；是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关注的是具体人物及事件而非抽象概念等。因此，“故事”（*story*）也被视为叙事的同义词，它们的区别在于：故事更关注文本后面的情节或事件的因果，而叙事则更关注讲述本身。但对叙事一词进行词根分析，可知其拉丁词根 *narrare*，意为“重述”，其更深的词源是 *gnarus*，来自于印欧词根 *gno*，即“知道”。因此，叙事又是一种知识生成体系，可以生成、引导、传播知识，并在人与人之间形成共识，从而激发社会行动和变革。叙事在人类社会和知识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兼具想象、知识、描述等特征，在经过后现代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之后，已成为一个可以包容神话、历史、诗歌、文学、法律甚至哲学理论的概念，成为人文学界最常用词汇之一。本书用叙事一词来指称圣经文本，尤其是从《创世记》到《列王纪》中博杂的文献材料，正是由于它所具的广泛包容力。

“族群”一词，本指一个民族中的次级群体，但由于近来社会人类学的讨论越来越意识到民族的主观性、模糊性和变易性，所以族群一词逐渐扩大

圣书与圣民
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

为泛指各个层次的群体。这样概括“族群”与“民族”之间的区别：“民族”是指在近代国族（nation-state）运动影响下，通过学术分类、文化识别与政治认可而产生的确定身份如中华民族、汉族、满族等；“族群”则可指群体中各个层次的族群身份，甚至可泛称所有以血缘或拟血缘方式而结群的社会现象。这样的“族群”概念较好地对应了现实生活中族群身份的变易和模糊性，因此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更多地称“族群研究”或“族群理论”，而在政治教育中才称“民族理论”。本书讨论对象是古代犹太—以色列族群，族群尚处于起源阶段，族群边界、本质界定尚不清晰，“民族”这一概念显然不适合，因此本书多用“族群”一词，只在表明“民族学”这一学科时，才约定俗成地用到“民族”一词。

其次是关于“犹太—以色列”族群这一概念。古代以色列族群史、圣经文本史的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些基本概念展开的，类似于中华民族的华夏、炎黄等，在此处只能简单交代。以色列既指北部王国，亦指全体认同耶和華信仰、认同圣经历史记忆的人，南部犹太人亦称自己为以色列人；犹太既指南部王国，亦因圣经叙事主要被南国所编纂，故犹太支派在整部圣经记忆中占据显著地位。南国后被流放巴比伦，由波斯治理，被称为“犹太人”而成传世的族群名称。因此，以色列人、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南部犹太、北部以色列两个次级族群之间的融合。而这两个本为次级群体概念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又分别上升为对融合而后的“犹太—以色列”族群的称呼，使其内涵只有在上下文中才能得到清楚辨析。本书以“犹太人”作为对南部犹太人民的称呼；“以色列人”既指北部以色列人民，亦指总体的以色列人，既有民族含义，又有宗教含义；“犹太—以色列”族群指南北融合的整体族群；“犹太人”指后流放时期及此后的犹太民族。

最后，关于本书的总体结构。第一章是对全书研究思路的理论阐释，分别提出“层累形成的以色列古史”、超越“层累说”等命题，并结合历史学理论中的叙事史学以及基督教神学界的叙事神学，提出对圣经叙事的社会记忆诠释，强调历史叙事与族群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之作为以下诸章对圣经文本史与以色列族群史进行讨论的总体理论指导。

接下来的第二章是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族源记忆的讨论，第三章是对出埃及记忆的讨论，第四章是对征服迦南叙事的讨论，大致涵盖从《创世记》至《约书亚记》即“六经”（Hexateuch）这一范围。它们可以归为第一部分，因为这一时期可称为“以色列古史的传说时代”，考古研究与圣经叙事有相当大的出入，极小主义者（或可称为“圣经疑古派”）对此用力甚勤。但对于以色列族群的构建而言，“六经”却是他们的基础历史，以色列族群的形成、本质界定，都来自于这一根基性的历史记忆。因此，这一部分既讨论疑古派对圣经叙事的质疑，以及信古派的回应，更将重点分析圣经叙事对于以色列族群形成、本质界定的影响。

第五章以考古学发现为主要材料，讨论古代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中央山地的起源问题，迦南人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迦南崩溃与以色列人出现在迦南之间的关系将被重新审视。从考古材料可知，以色列人并非外生于埃及，而是内生于迦南；不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而是迦南崩溃导致以色列人出现在中央山地；以色列人不是单一地突然出现在迦南，而是多元地缓慢内生于迦南。《士师记》中的圣经叙事隐蔽地保留了以色列人的内生多源记忆。接着的第六章，考察以色列人的另一个族源记忆版本，即“十二兄弟祖先”衍生出联盟的十二支派。本章将结合对中央山地的历史地理分析，讨论在早期以色列人内部存在的多层级、多中心的支派体系，认为早期以色列只是一个非常分散、族群边界模糊、以支派或家族作为社会支架的生活共同体。在这一理解之下，圣经关于以色列支派的“十二兄弟祖先叙事”也将得到新的理解。

“兄弟祖先叙事”一方面反映的是支派之间的平等、分立、多元的松散关系，另一方面也开始强化诸支派作为一个共同整体之成员的观念，“以色列”族群边界开始建立。第五、六章共同讨论了以色列族群及其文明的起源问题，关注的是前国家状态的以色列，可归为本书的第二部分。

第七章讨论“大卫—所罗门”的统一王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囊括南北两部的统一王国，一直是考古和圣经学者争论的焦点。本章讨论疑古派与信古派的争锋，亦从社会记忆诠释的角度来分析圣经的统一王国叙事对于族群构建的影响，并从大卫与所罗门宗教形象的差异，分析圣经编（著）者对

于神人关系之两面性的理解。第八章讨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的历史命运以及它们对于圣经文本史的影响。无论是经外文献，还是考古材料，对这一时期的了解都较为深入和具体。北国较为强大，但早亡于亚述，其历史记忆被南国所掌控，因此北国与南国的圣经形象与历史情形有很大差异。这一时期是以色列文明的“轴心期”，也是圣经编纂的黄金时期，希西家、约西亚这两个常被圣经读者所忽视的人物，恰恰是塑造圣经历史记忆的关键人物。通过他们的宗教政治改革和圣经历史编纂，“犹大—以色列”国族才真正成型。圣经以色列史不能按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约西亚的次序“顺着读”，而应该“倒着读”，倒着读的起点就在希西家和约西亚。这两章讨论的是以色列的王朝时期，也是圣经历史记忆定型的核心时期，可归为本书的第三部分。

第九章讨论流放时期的生活处境以及人们的圣经历史编纂，巴勒斯坦留居群体、巴比伦流放群体的生活处境和圣经编纂将分别加以讨论。尤其是后者，因为流放群体吸收了相当的两河流域文化，并从流放处境出发再一次“倒过来”对圣经历史记忆进行编修，这对以色列族群本质的再定义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第十章讨论波斯时期回归群体的生活处境和圣经编纂。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公民社团建立起一种以圣殿和祭司为核心的神治社会，以此为无国无君的以色列人继续保持着独立的族群身份。他们既重写以色列史即《历代志》，又对以色列历史的原型事件——出埃及进行“再回忆”，形成神治社会的出埃及记忆，即五经中的祭祀文献。这两章讨论的是以色列的后王朝时期，圣经编修在这两个时期接近完成，可谓定型期，可归为本书的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是一个简单的结语。“层累而成的以色列古史”使圣经存在着多元、丰富的历史和神学传统，它们在不同时代塑造着以色列群体的自我理解。另一方面，层累着的它们又形成一个新的整体，相互交涉、相互诠释，构成一个意义之源，衍生出丰富而生动的意义，不断催生出新的信仰群体。

Abstract

A. Research Topics and Significance

As a famous Chinese idiom says: “things are classified while people are grouped”, it is a fundamental desire of human beings to be identified within a group. Though people believe the question of “who we are” is essential for their identity, the anthropologists remind us that the true question is not “who we are”, but “why we claim who we are” and “how we claim who we are”.

According to the boundary-making theory in anthropology, an easy way to understand human grouping is an analogy: we can make a circle by only drawing a line on a white paper. It mean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especially ethnic identity, depends on the boundary drawn between “our group” and “their group”. It seems that this analogy has presupposed that the identity is only an outer marker to distinguish “we” and “they”. However, to identify oneself with an ethnic group is much more than just to make an outer marker. It is also a cultivation of inner consciousness, or an agreement with a spiritual ideal, and finally an affinity with a moral community. Therefo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 better analogy is that to make a circle on a white paper needs not only drawing a line but also painting some beautiful colors.

To make the boundary between “we” and “they”, or to signify the ethnic identity with a specific spiritual and moral meaning,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methods is to narrate or write the historiography. The goal of narrating or writing the historiography is to face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by remembering the past.